

这是我的道路,你的道路在哪里

■胡泳

唯我论者坚信一个人的自我是唯一的现实,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成功的领导人,常常会被这种倾向所诱导。老的见闻说,一位年轻人在纽约城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起初乘地铁去上班。随着他的升迁,年轻人搬到了郊区,改乘火车进城。最后,他出任首席执行官,有专职司机送他来回。换言之,他的成功令他越来越远离他人,远离环消息,远离同他人的令人不快比较。

无论在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这一模式都司空见惯。在一个异乎寻常的声明中,美国特拉华衡平法院的大法官批评华特·迪士尼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埃斯纳,说他“把自己加冕成为他个人的魔幻王国的无所不在、永远正确的君主”。然而,唯我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傲慢专横的首席执行官或像克瑞翁(神话传说中的希腊国王)这样的统治者之中;在阿瑟·米勒的《一个推销员

我们都是从昨天过来的

■孙睿

人这一生,如果看做一部戏,起承转合,按 80 岁演完算,30 岁差不多到了这部戏的“承”了,该“转”了,个体差异越来越明显。但逆推 30 年,也就是在“起”上,大家的“起”法,基本都一样。

那时候贫富悬殊不大,大家都没钱,但都生活得挺美,以至于那段生活成为很多已经开始回忆人生的“80 后”遥想往事时的甜蜜素材。

小时候,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印象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下面,一群人站在路口焦急地望着红灯,有的背着包,有的拎着包,有的夹着包,绿灯一变,行色匆匆走过斑马线,背景是流水般的车辆和写字楼大屏幕上播放的广告,一派繁忙。这是我在电视里看到的情景。

现在北京也成这样了。我小时候的北京可不一样。变了何止北京,还有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

小时候喝的铁皮桶的麦乳精、玻璃瓶的橘子汁现在都看不见了,大大泡泡糖和小浣熊干脆面还有,但已经不是当年的包装了。现在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包装精美的食品,是我小时

出走与回家

■林怀民

1969 年 9 月,我初到美国读书。在旧金山机场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尔摩……

那是个惊吓的启蒙经验。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课本的地名,原来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那年 5 月,摇滚乐、大麻、性爱,50 万人大聚会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震动了全球的年轻人,而我来自戒严的台湾。一年多以后,巴黎、东京、纽约、伯克利,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台北,我衷心崇拜的、曾在明星咖啡厅仰望的作家陈映真被警总抓走,写作圈子的朋友私下转告,不知所措,也有人彻底避谈。

可以这么说,到了美国,我才开始走进世界。

1970 年圣诞假期,我从读书的爱荷华,一路候补机位,用学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达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个水族馆。我第一次看到海豚,乐得张开了嘴。

看完海豚戏球,我对着太平洋的落日发呆,转头才发现人全走光了。到了馆外,停车场是空的,也没公交车。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边横着大拇指等便车。

一位长发嬉皮让我上他的车。他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要往何处去之后,便安静地说:“那么,到我家过一夜吧。”睡到半夜起来上厕所,只见到居室五六个长发男女安静坐着,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房间里有印度花香的味道,也许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静。我回房继续睡。第二天早上,另一个长发嬉皮顺路把我走在公路边放下。我横起大拇指等车。

1972 年,我打工存了钱,经欧陆返台。纽约到卢森堡的学生包机每人 90 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据手上的《每天十元游欧洲》,找青年旅馆过夜,也睡过公园,认识了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个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几个朋友,一起混了几天。吃饭,大家凑钱买几条面包,几瓶便宜红酒就打发了一顿。这些来自各国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要人离去,大伙儿就在便宜小酒馆为隔日启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来,误了车程,因此晚上再度退房,喝到凌晨……

在巴黎认识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达,他要去摩洛哥,我的护照要等上一两个月才能取得签证。从此我一人独行,去意大利和希腊。

在罗浮宫、在乌菲兹美术馆我第一次感觉到“颜色”。从希腊的天空和爱琴海,我终于知晓蓝色有无限的层次和变调。在日内瓦,我看到一本美丽的画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敦煌壁画。

通往曼谷的学生班机由雅典起飞。才走进世界,又得回到窒息戒严的台湾;观光尚未开

之死》中,威利·洛曼终其一生只是个推销员,却也生活在自己的令人悲哀的幻境中。

不以他人作为参照,个人就无法真正地判断自己。但是,哪些参照物是更切实际的呢?最容易的是那些有关财富、权力和身份地位的外在比照。这种比照突出生活的某一个维度,给出定量的等级,然后以此衡量每一个人的表现。亿万富翁比千万富翁干得好,而千万富翁又胜过了百万富翁。

外在的标准通常在人的早年生活中就被植入了,因而它们的诱惑是很难抗拒的,即便后果清晰可辨。有位经理人说他严厉的父亲从来就对“A-”的成绩不以为然。父亲会说:“你可以做得比这更好。”该经理人后来感到自己的生活始终被他所称的一种“对一流表现的期待感”所左右。他说那是一种“个人所具有的最有害的期待感。它支配了我的其他期待和动力。它把我带向一种单一的决策,我常常得为这样的决策承受

幸好有童谣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郭靖,那么傻也有姑娘喜欢,还会武功,可以为民除害。现在我的理想是过自己该过的日子,可以不会武功,可以没有姑娘喜欢,也不要被民除害。

我们改变了生活,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生活和我们,用政治书里常出现的一个词说就是:相辅相成。

我们能改变很多事情,唯独不能让年华不老去,“80 后”已由当年的小屁孩,一不留神变成了剩男剩女,不经意间,我们长大了、老了……

小时候流行一句话,“我们是生长在蜜罐里的一代”,我们还没吃透这句话的意思,也没怎么觉得尝到了生活的甜头,就开始把这句听来的话用在作文里了。长大以后,知道事儿了,发现蜜罐其实是空的,却被时间慢慢灌入苦水,自己成了房奴、车奴、孩奴,生活真是越来越好吗?还是越来越糟?

(节选自《一到三十就回忆》,孙睿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放,一般人收入极少,我不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出国,躲到厕所狠狠哭了一场。

没想到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出国,频繁的程度使我想起机场和坐飞机就要自闭地忧郁起来。跟云门(台湾专业舞团——编者注)出国是工作,十次九次,演完第二天必须离开;没有主办单位可以大方地让三四十个人不演出,住旅馆。

1988 年到 1991 年,云门暂停的 3 年间,我随心所欲地跑来跑去。背起包包,住 10 美元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宾、尼泊尔和印度。

印度!许多人怕去印度,因为脏乱和贫穷,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这些,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两回气后,我有了“顿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时,火车一定会来。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终于摆脱时程表!

一次次的出走,孤狐的背包旅行,让我看到许多山川和隘孔,见识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后共通的人性。旅行为我打开一扇扇门。回了家,我阅读,追寻曾经触碰过的文化,关心去过的国家,远地的战争仿佛也与我有关。更重要的是:离开台湾,隔了时空的距离,台湾,还有在台湾的自己,变得特别地清明,因而逐渐培养出对付自己的能力。

台湾解严 20 多年,但是,我们仍然容易陷入岛屿的自闭,陷入消费主义的迷障。我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没有特定目的的贫穷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出走。

(节选自《高处眼亮》,林怀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泥火山豆腐

■韩良亿

罗山旧名螺仔坑,然我孤陋寡闻,先前从未听闻小村之名,当然也无从得知,就在台湾东部海岸山脉的西麓,秀姑峦溪畔有个秀丽如许的小村。

一切说来全是偶然,我和旅伴从台北出发前,除了确定头一天要到花莲之外,什么行程也没规划,打算一路搭着火车往南,一路晃荡,走到哪儿算哪儿。在花莲盘桓期间,听说靠近台东县界有个罗山村,是全台第一个有机农村,这可引起我的兴趣,近些年来,我越来越关注有机农业,却不知故乡台湾也有完全从事有机农业的村落。

于是就在细雨纷飞夜色中,来到村里。下了接驳车,山谷一片暗黝,民宿“罗山之家”的主人说,屋前几米就是水稻田。次晨,推门一看,眼前果真绿野平畴,昨夜的雷阵雨没有令葱绿的稻

情绪、精神和思想上的痛苦后果”。

永不停歇的竞争将每个人,甚至是那些最富才华、最成功的人都赶到了一架旋转无已的疯狂踏车上。作家戈尔·维达尔曾经半开玩笑似地说过,每次当另一位作家受到了好评,他自己的一小部分就会死亡。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拥有得更多。曾经获得一次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许该说是达到了其专业巅峰,然而,他们与玛丽·居里、莱纳斯·泡令、约翰·巴丁和弗雷德里克·桑格相比也会逊色,这些人都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

外在的比照要我们判断是谁首先到达终点线。与此相反,性格问题让我们专注于起跑线。在起跑线上,我们发现像我们一样的其他人,具备各自不同的才能、承诺、缺陷和忧虑。每个人都走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而不是某个轨道的分道上,他们的性格也必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受到考验。由此,用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对个人

幸好有童谣

■程乃珊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糕一包,糖一包,因因吃得哈哈笑,舅妈买条鱼来烧,头没烧熟,尾巴焦,外甥吃了快快摇——”南方多河道,水上交通便捷又经济,这里的一个“摇”字,生动地点明了江南水乡以船槽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地方特色。

旧时小孩大都与祖父母同住,外婆家难得去一次,外公外婆自然宠爱有加,故而江南一带又有“外孙皇帝”之称。连舅妈也不敢怠慢,特地买了条鱼做添菜。不知是不谙厨艺,还是在“外孙皇帝”前有点紧张,手忙脚乱地就将条鱼头没烧熟尾巴焦,其中满溢着朴实真切的农家之乐和诙谐之情。

还记得一首很美好的童谣:“蔷薇花朵朵开,后门口妮姐夫来,接伢”意思:‘我的’姐姐早点回,大麦圆子圆囡否,小麦圆子当点心。”讲的是一对小夫妻小别重逢后的喜悦。

小媳妇(姐姐)回娘家已小住数日,那开得满墙满篱笆的蔷薇花暗示了姐夫思念娇妻的迫不及待心情,一早就急急赶来接小媳妇回家了。小媳妇也归家心切,碍着娘家人的面,又不好太直白,只是三口两口地把碗里的大麦圆子吃完。

至于小麦圆子,借口带回家当点心吃,其实舍不得让男人多等,早点夫妻双双把家还。老百姓的夫妻之爱,没有情人节也没有玫瑰巧克力,就是如此一份纯洁质朴的长相守之情。

上海十里洋场,但在光怪陆离的都会大墙后面,小市民仍遵着自己的心意,守着日子,你这边灯红酒绿,杯觥交错、“蓬嚓嚓”,我这儿小老酒咪咪,小麻将搓搓,小乐惠,自得其乐。在上海流传极广的一首儿歌“淘米烧夜饭,夜饭吃好了。电灯开开来,麻将拿出来”。

接下来就转调唱起来了“搓搓小麻将,呀呀呀,来自白相相,呀呀呀”,无一不洋溢着小市民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平常心,且带有浓烈的海派气息。

石库门弄堂里的小市民过得有滋有味:买点萝卜干,切成小丁,热油里爆一爆,撒上一层干,只是房子形态不同,但是这些农家三合院,看在西方游客眼中,应该更有风情。”洁听了也不说话,脸上带着思索的神情。也许我太心急了,但希望她能把我的话听进一点点,一点点就好。

我们绕村漫步,每遇村人,对方总是先向我们这两个陌生人点头为礼,尔后亲热地和洁打招呼。小村有 500 多人口,但实际的居民并没有那么多,村民彼此相识,谁要是做了坏事,逃不出众人的眼睛,也因此这村子颇有古风,不但鸡犬相闻,而且几乎夜不闭户。

下午,我们到“大自然体验农家”,去看林家三口按照古法,不用石膏,而用天然的盐卤来点豆腐。那卤水很特别,汲自泥火山,是泥浆沉淀后浮在上层的咸水。

做豆腐的两项材料,有机黄豆来自家田里,水则是从瀑布接来的山泉水。素材完全取自本村,自给自足,更不劳长途运送、不耗汽油,少费

进行比较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用一句著名的问话阐明了这个道理:“‘这是我的道路,你的道路在哪里?’我会如此回答那些向我问‘道’的人。因为道是不存在的!”

“这是我的道路,你的道路在哪里?”这是个振聋发聩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帮助个人返回根本,了解对他们自身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被用作腐蚀物,剥去层层铁锈而露出金属的本色。

我们追问自己,有关生活和工作的良好的梦想,而不是最好的梦想。我们求索的是坚实的道德准则,而不是最好的道德准则。根本的观念在于,从别人那里获取教益、洞见和警示,而不是看谁距离某项目标更接近了。在那些赋予生活以价值的东西当中,很少有几样能够被放进一个标准化等级体系里加以衡量,比如爱情和友谊。

(节选自《新周刊》,361 期)



图片来源: <http://caizhisong.blog.arttron.net>

■蔡天新

1

在远古时代,随着器械的改进(例如有柄的斧头)、不经意的种子散播、家畜的驯养(首先是狗)、陶器的使用和编织的开始,农耕时代揭开了序幕。不过那时候的人类还是游牧民族,生活没有保障,充满了劳累、困乏和焦虑。渐渐地在那些阳光和水源比较充足的地方,例如尼罗河两岸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们遇到连续多年的丰收。这些地方的有些人不再走动了,他们不知不觉地定居下来。

可以想见,起初定居者与因循守旧的游牧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后者随时进行袭击、掠夺,但不作停留。于是,定居者慢慢地聚拢起来,以对付游牧者的攻击,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村庄,它是人类最初也是最本原的聚集地。

1971 年初春,随着母亲工作的调动,我从城南搬到了城东北,来到王林乡一个叫王林施的村庄(那时叫王林公社王林施生产大队的地方)。这次迁移把我们娘俩进一步下放,母亲从中学到了小学,我则从“名校”樊川小学到了村办的王林施小学,我和母亲第一次成为了校友。

我记得,母亲第一年教的是四年级,比我读的高一个年级。她是小学里唯一的公办教师,其他老师都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包括校长,他是一个瘸腿的单身汉,极富心计。可是,调皮的同学有时也会乘他不备,跟在后面模仿他走路的姿态,令人捧腹。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校长终于从远方的村庄娶到了一个媳妇。

多年以后,我在瑞士日内瓦湖畔一座叫拉芬尼的村庄,度过了如梦如幻的三个星期。我住在大文豪海明威、纳博科夫和加缪等下榻过的房间里,四周被无尽的绿色和鸟鸣所包围。这一经历无疑强化了村庄的概念,可是,我小时候的王林施村却连一片绿地也没有,甚至没有电灯和自来水。

小学校舍全是平房,东西和南北均不足 80 米,操场的一角有一个沙坑,上体育课时同学们用它来练习跳高或跳远。全校只有一扇门,没有传达室,但却有围墙。没有喇叭,没有舞台,没有会议室,仅有的一个礼堂也是半敞开式的,每逢村里开大会,都要借用这个场地。做广播操时,体育老师吹着口哨或扯大嗓门喊。学校难得开一次运动会,即便开也没有长跑项目,短跑比赛设在村头的石板路上。

2

著名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多卷本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谈到在“四大发明”以外,中国人率先使用而后传递到西方的机械和技术。例如,独轮车(比西方早 9-10 世纪),铸铁(早 10-12 世纪),河渠闸门(早 7-17 世纪),瓷器(早 11-13 世纪),弓形拱桥(早 7 世纪),等等。

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李约瑟的书中还谈到我儿时王林施村见到过的一些东西,例如活塞风箱、风琴、竹蜻蜓、船尾舵、龙骨车、石碾、提花,这 7 项发明中,除了风琴、竹蜻蜓和船尾舵,其他恐怕已经或即将进入博物馆了。

我们用得最多的是活塞风箱,这是母亲炒菜烧饭时我干的体力活。木制的风箱除了活塞还有活门,它通过压缩空气产生气流,使得炉火旺盛。所谓的活塞其实就是一个能往返运动的厚木板,木板四周打了许多小孔穿入麻绳,捆扎上一圈鸡毛,起到活塞环的作用。木板在鸡毛作用下在箱中处于悬浮状态,既减少了木板运动时的摩擦力,又处于气密性。

说起捆鸡毛,这是个巧活,要捆得均匀,量也要适中。好匠人捆出来的风箱,风力既大,拉起来也轻松。再来看活塞板,它与两根木拉杆连接,拉杆长度略长于木箱,伸到外面。通过连续反复推拉连杆使活塞木板在箱子里往复运动,产生的风力从风口间歇吹出,那里有一个活门。

说到活门,那也是个很关键的零件,它是一块能左右摆动的薄铁片,设置在木箱内侧的出风洞口,相当于单向阀门。它必须保证,无论活塞板是推进还是拉出,都把风由内向外吹出。值得一提的是,炉灶上一大一一小两口铁锅旁边还有一个加盖的圆柱形空间,是专门用来加热洗脸水的。在没有供热系统的年代,那是一种聪明的节能小发明。

提花是妇女们做的活,房东施老太太虽说是小脚女人,牙齿几乎掉光了,却是个织布能手。她用的是梭子机,脚踏的机器靠几个两头削尖的长方形梭子把不同颜色的丝线织成带子。每个梭子用不同颜色的丝线,通常是蓝色、白色和黑色,织出来的大多是对称的线形几何图案,如长方形、三角形、梯形等的拼贴,很少有圆弧或其他弯曲的花卉图案。

(节选自《小回忆》,蔡天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能源,真是再“低碳”、再“慢食”不过。这种制法失传 40 多载,这几年才在村里老人家的口授心传下重现天日。

林家大叔先将泡了 4 个多小时的黄豆磨成汁,倒入大灶熬煮,大婶拿着大勺,不停搅拌一大锅豆汁,以免焦底,待豆汁沸腾,滤去豆渣,再回锅加卤水一起煮上一二十分钟,等豆浆凝结,捞出置于垫有棉布的木模中,用力加压成形,分切成方块,就是本地特产的泥火山豆腐了。

大婶拿来碗盛,招呼我们尝尝,我夹了一块,蘸了点酱油送入口中,浓浓的豆味中隐约有股焦香,口感不那么嫩,却有弹性,真好吃。我吃着吃着,觉得自己尝到的不单是一小块豆腐而已,那素朴却隽永的滋味中,还包含着亲切真诚的人情、对土地的尊重和田园牧歌式的风光,这些或许才是美味的关键吧。

(节选自《南都周刊》,2012 年第 18 期)